

华夏

——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变奏

从华夏族团(农耕族团)与夷狄族团(游牧族团)的力量消长变化的视角、从考古与历史整合的视角,探索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和中华多元一体运动的历史,是一个新视角,一个新探索。

张碧波 庄鸿雁 著

华夏与夷狄问题,华夏族团与夷狄族团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中华历史、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始终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中华历代王朝——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中心的政权,抑或是少数民族即所谓夷狄族建立的区域性和全国性政权,华夏与夷狄两大方面的力量消长、发展演变、碰撞融合,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进程,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格局,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多元一体体系或格局的形成与确立,影响着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影响并推动中华文明史的前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华夷变奏

——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 张碧波, 庄鸿雁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207 - 08580 - 1

I. 华… II. ①张…②庄… III. 民族文化—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1908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封面设计:张 涛

华 夷 变 奏

——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张碧波 庄鸿雁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20 00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580 - 1 / K · 1050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言

“中华多元一体”是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明确提出的重大学术命题。实际上,对于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可谓远矣,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春秋大一统”的华夷观、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秦汉王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大帝国之后,古代中国在统一与分裂交替发展的过程中,由古代社会走进近代社会,这期间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已为古今中外学者所认同。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夏(汉)与四夷(夷狄)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怎样的贡献,中外学术界的认识则存在着诸多的差异。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传统的“正闰观”、“尊华贱夷”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不仅是以汉族历史为中心,而且存在以汉族历史取代中国历史的倾向,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虽有前贤撰文论述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但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20世纪70年代,随着考古学工作的广泛开展,从中原到边疆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遗存的大量发现,使人们开始质疑以往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学说,随着考古学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为“多元论”观点的提出,历史学界、民族史学界也开展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华夏)与边疆民族(夷狄)关系的深入探讨。80年代初期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著书撰文,如陈连开《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等。1986年初张博泉先生发表论文《中华一体论》(《吉林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其后张先生系统论证这一学术思想的著作《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于1995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中华一体”的学术观点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和思想,从历史学的层面宏观地论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汉族与诸少数民族的关系存在着“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基本特征。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论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其后由费先生等人著的同名著作,于1989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从民族学的角度宏观地论述了汉族与诸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并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发展过程。费孝通先生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重大反响,很快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全面审视中国历史。虽然有些学者最初认为“中华多元一体”的观点是为当代政治服务,不属于学术研究,然而,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多元一体”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中华一体”的学说,是涉及到多种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其内涵,张博泉先生曾概括为“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即我国是由多元的民族和文化经过接触和交融发展,结为一体关系;又在一体之下保持各自的民族与文化特点,以多元的形式共存发展。这是中国历史的实际和基本特点,它体现在中国历史时空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领域与各层面,而且反映于我国各区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中国各个省份的古今历史,无论内地省份,还是边疆省份,无一例外,如果离开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只能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反之,如果离开了汉族的历史,同样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然而,如何将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过程论述清楚,则是今后学术界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攻克学术难题,费孝通先生曾说这是他在民族研究领域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1996年日本大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书面报告,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也表明“中华多元一体”的学术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费孝通、张博泉等著名学者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理论功底,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认识到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的根本性特征,并勾勒出“中华多元一体”总体发展的基本线索,但要具体地论证这一重大学术命题,还有待于开展大量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张碧波先生及弟子庄鸿雁的新作《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从古代中国农耕民族(华)和游牧民族(夷)两大族团的力

量消长转化、文化碰撞融合的视角,探讨了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作者对贯穿于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矛盾、对立、碰撞、交流、融合的文化脉络,进行了分阶段、分层次的探索与研究。虽然我仅读了该书的内容简介,但从作者提出的主要观点中可以看到其不乏新见,如从华夷文化对抗、整合、形成新文化形态的角度,对传统的“用夏变夷”、“汉化”等历史观念进行的剖析和论述,认为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以华夏(汉人)为中心的王朝(政权),抑或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和全国性王朝,都存在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碰撞融合的基本线索,并认为历史进入辽宋金西夏时期以后,华夷之间强弱态势出现转变,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对农耕民族(华)和游牧民族(夷)两大族团从文化对立走向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进行通贯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华夷文化多元与一元的辩证关系等等。该书抓住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基本的社会现象,对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宏观的探讨,这对于探讨中华多元一体的运动规律和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历史进程及中华文化传统之丰富性、多元性、多样性诸特点具有学术价值,相信其对“中华多元一体”学说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碧波先生是多年从事北方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前辈学者,虽已年过八十,仍笔耕不辍,这部新作是他在研究北方民族文化史过程中对华夷文化交融问题的新认识。作为后学,我本无资格为前辈学者的著述作序,但承蒙张先生的厚爱,坚持要我作序,故对该书所探索的学术问题谈一点粗浅认识,是以为序。

程妮娜

2008年8月8日于吉林大学

前言

“蛮夷华夏，寇贼奸宄”，自尧舜禹创造了华夏中心观念始，华夏与夷狄问题，华夏与夷狄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贯穿古代中国文化史、文明史始终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历代王朝——无论是以华夏汉族为中心的政权，抑或是少数民族即所谓夷狄族建立的区域性、全国性政权，这个问题均是这些王朝的统治集团所最关切并下大力气争取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华夏与夷狄两大方面的力量消长、发展演变、碰撞融合，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进程，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格局，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确立，影响并推动中华文明史的前进。我们可以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从华夏与夷狄的力量消长变化与碰撞融合中认识中华文明史的运动规律，认识历史文化动力学诸问题，认识与掌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运动史这一根本性问题。

全书根据中华历史序列，共列十个问题：

华夏人地缘政治与文化视野中的诸夷，其根本性的区别是文化上的，华夏人以高水平的文化与文明自居，视夷狄野蛮落后，这就构成了华夷的界限，构造了“用夏变夷”的思想文化体系。华夷之辨、华夷之防，构成了华与夷、天下与四海的主流历史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与夷狄诸族间政治、文化激烈碰撞的巨变时代，其中有五霸、七雄诸政治集团之出现（其如出于荆楚的楚庄、出于西戎的秦穆等夷狄而华夏化）：“平王之末，周遂凌迟，戎逼诸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揭示出这一时期各族团的争取权利地位的激烈冲突，在用夏变夷与秦戎称霸问题上，考察了秦人出于戎、秦人的巫史文化、秦始皇的统一与文化之变异诸问题。在用夏变夷与戎逼诸夏的复杂历史发展过程中，华夷从对抗走向融合，从文化的多元向一元转向，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文化对立走向文化认同，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大一统的时代到来了。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秦汉时期进入了以王朝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圈和以匈奴为主体的草原游牧文化圈的对立与对抗的时代。秦人从西到东的文化整合,刘邦集团则从南到北的文化整合,秦汉作为新型的华夏族团(从西戎和南蛮整合之后转型为华夏族团),已不同于夏商周,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华夏族团了。两大文化圈的冲突,直接影响了历史文化格局的变化,造成两汉历史与社会的危机与衰落,开启了两大文化圈长期对立的历史,形成了华夏-汉王朝与夷狄族团对抗的中华历史文化模式。

五胡乱华——两晋时期是一个统一走向分裂时期,夷狄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的时期。北方胡族在与两晋王朝的碰撞冲突中,造成南北大分裂,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移;北方诸族政权在其封建化的历史进程中,在文化整合进程中,创造新文化形态,突破旧传统,打破了华夏-汉族“天命为王”、“无戎人而成帝王”的旧传统观念,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在高层面的多元与一元辩证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

关于“汉化”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碰撞交流融合或谓之文化之整合、改造以及形成新文化形态,构成新文化传统的问题。汉化一词不足以概括这种复杂的文化上的多元与一元辩证发展关系的丰富内涵。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整合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传统简单化,没能对不同文化间的对立统一中力量消长变化,作出科学概括与合理说明。一个新兴政权(不论其为华夏族或胡族)总是要在本族、本政权的文化基础上,吸收、继承、扬弃前代的历史文化,经过这种多元文化的整合,创造了适合本政权与民族发展的新文化形态,推动历史的发展,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传统正是在这多元文化碰撞、整合中构成一种动力,向前发展着。

南北朝是以拓跋鲜卑为主导的中华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的时代。“从代王到魏国”,改代为魏是与东晋争正统,否定按民族划分华夷的传统观,提出按地域、按坚持中华文物典章制度重建华夷之辨的新观念。而崔浩等人的“国史案”表明北魏王朝特殊形态的夷华文化冲突,表明王国内部新旧力量斗争的严重性与长期性的历史文化特点。

孝文帝“用夏变夷”的整合运动构成北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等的历史文化大改造、大整合运动,使中华文化更具多元性与多样性,更具生命力与活力,更具广泛性与民族性,为使中华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提供了强大动

力,创造了北朝文化,主导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发展,为中华一统提供了制度渊源与文化基础。

隋唐时期是构成中华多元一体的关键时代。杨隋与李唐是胡化了的汉族政治集团;四夷君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中华天下之共主;李世民对“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服戎狄”的历史进行反思,进行总结。而“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为天可汗”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正在于李世民用“独爱之如一”的华夏与夷狄之平等地位、权利均等的政策路线来代替;文学家李华提出“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的新华夷观,这在中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举措、新观念,才有“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的感知,从而达到华夏与夷狄的大融合,大交流。

这构成了民族观念、民族关系上的新变化,构成国家观念上的新变化:从中国之主到中华之主,“从服戎狄”到“独爱之如一”;从华夷之辨、华夷之防到夷夏交融;在华夷不分、胡汉共列的社会现实氛围下,胡风、胡气——夷狄诸族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祭祀礼俗诸多方面——草原穹庐文明、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中华华夏文化的大交融、大交会,构成有唐一代的“唐室大有胡气”的文化景观。

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羁縻制、羁縻思想与措施是以华夏为主的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及其政权的一种联系、维护、束缚与管治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具象化,是实现中央王朝多元一体体系的战略措施。

杨隋集团、李唐集团均出身于北朝,均是胡化了的华夏集团。在这一新的大一统的历史时期,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模糊了,华夷之辨、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淡漠了,天可汗,一家天下,华夷如一的理念成为社会主流,这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构成及其特色,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的边疆界限的形成,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体系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

辽宋金时期是中华历史剧烈变动的时代,从统一走向分裂又从分裂走向统一,主要是源出于中华东北地区的民族集团及其政权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的后期阶段,中华民族历史,中华多元一体的运动历史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特征。

从统一走向分裂,以司马光为代表在史学观念上出现新观念。这是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与论列所谓“正闰之辨”,指出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不论统一王朝,抑或是分裂政权均为中华列国,其历史存在,均有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均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打破了“华夷正闰”的传统观念,打破了华夏-汉文化中心论,强调了中华多元一体的中华观念。

司马光这一新观念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在中华民族形成史上,在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上,在华夷力量消长变化史上,华夏-汉族(隋唐之后新的整合)的力量已显露出弱势态势,新兴族团将成长为历史的主导力量,它也预示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大辽国提出“契汉一家”的观念;大金国提出“中州一体”、“皆是国人,不宜有分别”的中华一体观念。从天下一统到中华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契丹的中国不只是中华历史文化现象,也是世界历史文化现象,从契丹建大辽国开始,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就出现了北重于南,北方民族成为中华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就进入了最后的形成与定位的关键阶段。

元朝是中华历史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是中华史上首次由北方民族——蒙古族统一中华并成为历史主导力量的时代,中华历史上的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出现新变化。

从蒙古汗国到大元帝国的建立标志蒙古族摆脱了氏族血缘制度与部落联盟的束缚,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跨越,忽必烈国号“大元”,建大元帝国“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从中华经典中找到精神武器,继承中华传统文脉,标志从蒙古汗国向中华帝国转型,大元帝国已成为中华文明史、中华历史序列,成为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上重要组成部分。元朝之“文物典章制度的文化整合”,忽必烈接受汉族文化精英提出的“儒术有补于治道”、“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信用先王之法”以及许衡提出的君主文化论、国家文化论等诸方面,说明中华文化精华之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对大元帝国之汉胡——华夷文化整合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大元帝国融入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元代文化,为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有人认为蒙古族虽然力图使本族融入中华民族体系之中,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但“终未能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多民族国家的‘统合’(消除民族陋习,一体化)至今仍是未能完全成功解决的世界性问题。”我们认

为所谓“一体化”并不要求两种不同质的文化“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不切实际的；所谓“一体化”是指“多元一体”，任何时代的多元一体，其内涵是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即由多元走向一元，一元中包含着多元，而一体多元正指以蒙古族为历史主导下的大元帝国的一体多元。任何两种异质文化经过碰撞、交流与融合，最后经过整合而成为新质文化，其新质文化仍以主导历史的民族文化为中心主线，这可能是一些论者对大元帝国文化之与中华儒家文化未能达到水乳交融程度的一种责难吧！

纵观中华历代文华史，不论是华夏族或夷狄族，在文化融合与文化整合中构成每一时代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总是以这一时代的历史主导民族文化为主体，并在连续性的文化发展中构成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

有明一代，是由华夏族团为主导的时代，在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处理上，明王朝初时倡导胡汉一家，天下一体；接着又堕入“内中国而外夷狄”的末路。这种民族政策的双重性在民族关系上造成民族分裂的严重历史局面，最后因阶级矛盾尖锐化，在农民军的打击下，明王朝在与以满族为主导的民族矛盾冲突中，走向灭亡。由此，中华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由游牧民族为主导的中华大一统的时代。

满族起于东北，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继蒙古族之后建立的统一大帝国。有清一代是以满族为主导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游牧民族成为中华帝国的主导民族，坚持实行满汉一体观念与天下一家观念，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推行历史文化大整合工作，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传统、中华多元一体的中华体系的建立和最后定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皇太极的改族改制，改女真为满洲——用以消除汉族对金朝的积怨：“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自今之后，一切人等止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改变族名是出于政治——民族关系考虑，而不是从民族文化源流的考虑。在政治体制上，改后金为清，宣布“率遵汉制”。关于大清国号的文化内涵问题，皇太极并未解释，《清史稿》也未加以说明，一直成为一个难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是有崇拜天、崇拜天神的文化信仰体系，自匈奴族开始，鲜卑、突厥、蒙古诸族均崇拜天，如突厥之称青突厥，蒙古之称青蒙古。这种颜色崇拜，反映了北方族一种文化信仰——天之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为青色,天之为苍色。“天苍苍,野茫茫”,其始祖妣为“苍色狼”,成吉思汗建国称“库克蒙古勒”,库克即突厥、蒙古之称青色。“来路不明之清代国号虽经不少学者猜测,究无一种满意解答。吾人如以‘青’释‘清’,似乎亦可备一说。质言之,即其所取者,殆为塞北民族自古所尊崇之青天之‘青’字,顾中国历代正统王朝,绝无以颜色作国号者,殆十七世纪满人受汉化深,特增加水字偏旁,而成清天之清乎?”(《韩儒林文集》第487页。)则青之为昊天圣色,青之为清——满汉文化融合之结晶,与其中当掺有五德终始五行相克(明为火德,清为水德)的文化内容,这是文化大融合、大整合的结晶,则大清为大天,为最清明正义,清正廉洁之世界,为世界头等之大国。

清朝统治者的中华文化遗产大整理,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大整合,为中华文化传统定位作出了贡献。

满族主导下的大清王朝,是多元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大整合的时代,这种一代又一代的文化整合,这种层垒式的文化整合,最后构筑了极庞大的多元系统、多元结构、多元交融的中华文化与文化传统,而清代文化大整合,使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个时代最后形成,中华疆域在这个时代最后定位,中华文华的多元一体模式在这个时代里完成。此后,五千多年的华夏与夷狄的碰撞冲突让位于社会阶级冲突和其后来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随着大清帝国的日益封建化,日益腐朽反动,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最后走上末日。古老的中国,走向新时代。

这就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史、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的基本认识。从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到文化生态不断地自我调整整合,主宰着中华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目 录

序言	(1)
前言	(5)
第一章 夏商周时期的华夏与夷狄	(1)
一、华夏与华夏中心观	(1)
二、华夏人地缘政治视野中的诸夷狄	(7)
三、夏商周出于夷狄而融为华夏主流的文化脉络	(12)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变奏	(16)
一、楚庄、齐桓称霸	(16)
二、秦戎称霸西陲	(19)
三、从晋献公到晋文公：晋文化中的华夷变奏	(28)
四、赵国与华夷文化	(41)
五、中山国与狄人文化	(50)
结语	(58)
第三章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兼及匈奴文化暨草原文化体系的考察	(60)
一、匈奴族源流的考察	(60)
二、农业文化圈与草原游牧文化圈的激烈冲突	(63)
三、匈奴文化及其文化体系的考察	(75)
四、北匈奴西迁问题	(97)
第四章 两晋时期的华夷变奏 ——“五胡乱华”的研究	(100)
一、晋人眼中的诸胡	(100)
二、五胡人物论	(108)

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

三、余论——“汉化”之再评议	(123)
第五章 拓跋鲜卑主导下的世界	
——北魏王国文化述论	(127)
一、从代王到魏国	(128)
二、国史案的背后——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	(133)
三、孝文帝“用夏变夷”的文化整合运动	
——北魏孝文帝元宏论	(145)
附记	(164)
第六章 隋唐时期一体多元历史新格局的探索	(166)
一、华夷变奏的历史回顾与总结	(166)
二、隋唐一统与中华历史的新阶段	(179)
三、地方民族政权与隋唐中央王朝	(194)
第七章 变动中的中华历史新格局	
——辽宋金时期的华夷变奏	(201)
一、新时代与新思潮	(201)
二、从天下一家到中华一体	(206)
三、华夏的中国与契丹的中国	(210)
四、关于“第三文化”与“征服王朝”论、“基本模式”论的辨正	(213)
第八章 蒙古族主导下的历史统一新格局	
——元朝时期华夷关系的新变化	(222)
一、从蒙古汗国到大元帝国——“大元”国号的文化透视	(222)
二、文物典章制度的文化整合	(231)
三、忽必烈之为“中国之主”	(239)
四、蒙汉民族文化融合举隅	(246)
第九章 “天下一体”的大明王朝	(251)
一、天下一体的新观念及其变异	(251)
二、明代的蒙古族	(256)
三、满族之崛起与明朝之灭亡	(263)
四、土司制度与大一统格局	(266)
结语	(271)

第十章 中华多元一体的最后定位

——清朝满族在多元一体体系上的贡献	(272)
一、满汉一体观	(272)
二、天下一家观	(279)
三、中华文化大整合	(284)
跋	(293)

第一章 夏商周时期的华夏与夷狄

“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这是《尚书·舜典》中虞舜对皋陶说的话。说明在尧舜时就已有了华夏与夷狄的区分，就有了华夏族团与夷狄族团的碰撞、冲突。孔颖达对其注曰：“猾，乱也。夏，华夏。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言无教所致。”虽然孔氏的注疏过于儒家气，但《舜典》已简约而概括地揭示了这两大族团尖锐激烈的冲突，而其所显示的文化冲突则更为深刻而剧烈。

一、华夏与华夏中心观

1. 说“夏”

夏者，大也，大人、手持斧钺的权威、首领、王者。甲骨文作𠩺（甲二五四）𠩺（𦉑）（一五三八）𠩺（𦉑一四）𠩺（甲七五五），是为执钺而立之人，“权威者、酋长或大奴隶主的造象”。“那些初民，他们的首领人物，全是以显赫武力，威慑内外的，有无上权威的征服者、压迫者那样的人自居，以此为荣，自称为夏，傲于其他部族。”^①

四夷观念始于四方、四方风、四时节令、四方神等观念。到了夏代，产生九州观念、五服观念和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金字塔式的王朝政治结构与统治秩序，由此产生天下与四海、华与夷、内与外等华夏中心观念；四海、夷狄与中心观念对应，华夏与夷狄，构成华夷之防的思想文化路线，主宰并影响着中华历史的进程。

是知，夏之名称出现是社会阶级出现的产物，是权威、酋长、王者的标

^① 康殷：《古文字形发微》，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志,进而成为族团的标志。

学界已确认晋南为夏之故墟。晋南在文献中有着不少关于夏族的资料。

《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原来唐叔虞所封的唐就是夏墟，而且还要他依照治理夏人的政治方法来进行治理，可见这地方保存夏人旧传统不少。什么是“夏虚”？“夏虚”者，原为夏人居住之处已沦为故墟也。（《左传·昭十七年·疏》：“虚者，旧居之处也。”）和上文封伯禽于少昊之墟，封康叔于殷墟，都是同一意义。杜注：“夏虚，大夏。”《括地志》记封刘累孙于唐的原文云：“夏后氏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虚，为唐侯。”亦说明唐是大夏之墟。原文并说明其地在翼城县西二十里。这是文献中所见的第一个“夏虚”。

《史记·吴太伯世家》：“周武王克殷……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集解》：“徐广曰：‘在河东大阳县。’”（《左传·桓公十年》杜注同）。《索隐》：“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虚。”《春秋大事表·七》：“夏墟，今为山西解州之平陆县……县东北四十里有古虞城。”今平陆县即邻夏县，表明这里确为夏人故墟。这是文献中所见的第二个“夏虚”。

文献中又提到五处大夏，指下列五地：

(1)唐，即今翼城。上列第一个“夏虚”杜预说就是大夏，是根据《左传·昭公元年》所载，高辛氏二子阏伯和实沉日寻干戈，后帝把他们调开，“迁阏伯于商丘”，又“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星名），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郑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大夏在汾、浹之间，主祀参星”。指明唐人所居的大夏在汾水浹水之间，正是翼城所在地。这是第一个大夏。

(2)平阳，即今临汾西。《齐语》记齐桓公“西征攘白狄”后段云：“逾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大〕夏，西服流沙、西吴。”《管子·小匡》同样的记载为：“……是当时齐桓公伐晋之事尝称为西伐大夏”，明言晋即大夏。这是大夏平阳说。这些禹都平阳之说，和前引《晋世家·正义》谓封于河汾之东“正合在晋州平阳”之说，都足以助成大夏在平阳之说。这是第二个大夏。

(3)安邑，即今夏县境。《吕氏春秋·本味》云：“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这是指解池之盐，地在安邑，而称之为大夏，可知以夏都为安邑，先秦已有此说。又《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虞州夏县东北